



世纪文库

元代社会阶级制度

蒙思明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元代社会阶级制度

蒙思明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代社会阶级制度 / 蒙思明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ISBN 7-208-06391-5

I. 元... II. 蒙... III. 阶级-政治制度-研究-

中国-元代 IV. 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8015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陈学晶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元代社会阶级制度

蒙思明 著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7.5

插页 4

字数 211,000

版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6391-5/K · 1225

定价 28.00 元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何元龙	张文杰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潘 涛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目录

自序 / 1

一 元前社会原有之阶级 / 19

(一) 宋之阶级以经济为骨干 / 19

(二) 金之阶级除经济外复有种族问题 / 26

(三) 元入中土时金宋之经济阶级大部皆未被破坏 / 32

二 元代法定之种族四级制 / 37

(一) 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之区分 / 37

(二) 四级等差待遇之法律与事实 / 46

(三) 种族阶级似以永保蒙古人之优越地位为目的 / 65

三 两种阶级系统之冲突及其混合 / 70

(一) 种族与经济两阶级制度之并存及其矛盾 / 70

(二) 经济势力潜移种族阶级之进行及其极限 / 81

(三) 两种阶级系统日趋混合之倾向 / 92

四 日趋混合而后元代社会阶级之实况 / 104

(一) 贵族官僚僧侣地主富商联合组成之上层阶级 / 104

(二) 拥有最多人数分为各种户计之中间阶级 / 130

(三) 由奴隶与佃户中分南北所组成之下层阶级 / 146

五 元代阶级制度之崩溃 / 174

(一) 元末革命运动之性质 / 174

(二) 种族仇视之复燃与蒙古政权之崩溃 / 181

(三) 革命目标之转移与经济阶级之存留 / 187

引用及参考书目 / 197

附录

燕京大学 1938 年版提要 / 212

燕京大学 1938 年版自序 / 214

中国古代史(元史)讲义 / 216

前言 / 216

第一章 元朝的建立和元代的阶级关系 / 218

第二章 元代封建统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 231

第三章 元代各族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所进行的
战斗和所取得的成果 / 240

整理后记(蒙默) / 262

自序

这是我二十五年前写的一个小册子。从那时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对这一研究范围的业务，目前已经是荒疏了。最近受中华书局编辑部同志们的鼓励，要我把它重印。本想认真加以修改之后以求正于今日学术界。但初一着手，就感到困难很大。因为旧作不仅有观点上的缺点和错误，也有取材上的缺点和错误；修改起来，实在改不胜改。修改所需的工作量，可能比重新写作所需的工作量还要大。而且局部修改之后，可能本身就不协调，形成一个既不是旧作也不是新著的体系混乱、观点矛盾的东西。因此就放弃了彻底修改的想法。要重新改写吗？这就必然给我提出一项新的要求：那就是重新阅读大量的元史资料，而不能停留在过去掌握的资料和过去对这些资料的理解的水平上。因为过去阅读和搜集资料时，是用当时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史实和选择资料的：一定对不少史实的分析，还停留在表面现象上而没有挖掘出它的本质；一定对不少的重要史料，由于受当时观点的限制而没有发现、没有搜集。这都须要在重读过程中加以纠正和补充。而且既要重写，也不愿局限于过去研讨的范围之内，而企图扩大领域，对整个元代的历史加以比较全面的分析研究。这就非用几年的工夫不能完成。这是我盼望在今后几年内来做的

工作，一下不能成为事实。因此征得中华书局编辑部同志们的同意，只将旧作中某些十分错误和不确切的词句加以删削和改正，基本上保留了旧作的形式和内容，为读者提供一点参考资料。这是我深深感到不自安的。

*

*

*

在这短短的修改过程中，感到旧作把许多最基本的观点和方法都没有弄清楚。但要加以改正，又会打乱原来的组织和体系。因此借这个机会把其中几个主要的错误之点提出，作一点简单的自我批判。至于取材不精确、分析不全面等类的缺点和错误，由于分量多而性质也属于次要，就不拟在这里一一提及。

首先，旧作对“阶级”一词没有科学地理解。把元代法定的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级的等级区分，也概称之为阶级。虽曾制造“种族阶级”“经济阶级”两词以示区别，但总是把不同性质的东西混为一谈。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对比和分析，就不可能做到精确和深刻。虽然结论基本上可以认可，但那是由于客观史实不容更易，而不是由于科学地分析所得出的结论。

其次，旧作把元代的阶级区分为三级，这是完全错误的。阶级关系表现为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基础则建立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面。在封建社会则具体决定于土地的占有关系。元代的压迫和剥削阶级，是占有土地而不从事劳动的宗室贵戚、高级官吏、僧俗地主；而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则是广大的无地或少地的劳动人民，其中包括军、站、民、匠等各色户计和带有更强大的人身依附关系的佃户和奴隶。虽然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是比较复杂的，不像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单纯。特别是在元代的诸色户计里面，确有一部分人，既是被压迫者，同时又压迫另一部分人；既是被剥削者，同时又剥削另一部分人。这是发展变化过程当中常有的现象，我们不应该否定这个事实。但应该分清他们在两种地位当中的主从，以确定他们的阶级地位。决不能把这一部分人另划成一级而列在两个对立阶级之间。也不

应把佃户、奴隶与诸色户计截然划分而在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中又分为两级。这样做就容易混淆阶级关系，而不易抓住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核心。

第三，旧作在对元代诸色户计情况的分析上，受了元代划分诸色户计的表面现象的束缚，作了烦琐的各别描述，没有从实质上加以系统的区分。如果按照他们所从事的生产的性质和他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来划分，则元代广大的劳动人民，基本上只能分为两类：即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或农奴，和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官局工匠或工奴。如占元代人口多数的民户，他们按规定种田纳地税、买卖纳商税，并承担一切杂泛差役。他们都是农业劳动者，是很清楚的。其次，如军户、站户，按规定都是种田四顷以内免输地税，不当杂泛差役。他们是以供军役或站役的形式充当差役，是以自备鞍马器仗或供应交通工具及使臣人畜食宿的形式交纳四顷以内耕地的地税的。他们基本上还是农业劳动者，只是力役的形式是固定的、世袭的，不同于一般民户而已。此外如依赋税所纳实物定名的葡萄户、糯米户、姜户等，和依所纳赋税的用途定名的养老户、脂粉户、医户等，实质上也都是农业劳动者。至于由中央政府或皇亲国戚设置的诸色人匠总管府管辖下的诸色匠户，他们或制造武器，或生产剥削阶级的消费品和奢侈品。因为他们是以全部时间从事手工业生产，产品又全部归于工局所属的主人；按规定他们不但不纳赋税，不当差役；而且因为他们没有独立的生产和收入，还由官给衣食或官支口粮。他们都是没有或少有生产资料的手工业生产者是很清楚的。此外，如盐户、淘金户、银冶户、炉冶户以及鹰坊、采珠等户，也都不纳赋税、不当差役，而由官给工本、官支口粮，也显然都是手工业劳动者。其他户计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归入上述两类之中。虽然这两类之间也不是截然划分的：如民户中有不少兼营手工业的，而匠户也有种田一顷之内不纳租税的规定。但这决不妨碍两类划分的科学性，因为他们都有为主的一面。以此来衡量旧作，就显得旧作烦琐、零碎，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现象上了。

第四，旧作对元代某些矛盾和变化的现象，只作了历史的分析，没有深入到阶级的分析。如元代对汉人、南人私有马匹、弓矢的禁令，是始终一贯严格的。到元末更严。不仅悉括汉人、南人马匹及弓矢，甚至聚众祈神、划棹龙船、立集买卖等聚集人众的活动都在禁止之列。而另一方面对汉人、南人入仕途径的限制，则是元初稍宽，而元末则更宽。不仅略增科目入选的名额，而且开纳粟补官的途径，废南人不入省、台、院为长官的旧例。对这种矛盾和变化，旧作只从客观情况的变化上进行分析，认为这是元代统治集团当元末人民大起义风起云涌的时候所采取的一面镇压一面收买的手段，却没有看出这种措施的阶级实质。因为真正能以武装力量反抗元代统治的是广大劳动人民，而能侧身于仕宦之林的只限于地主阶级；则元代统治集团的策略，是对劳动人民一贯高压，而对地主阶级则尽力拉拢。必须透过阶级分析，才能揭露这些矛盾和变化现象的阶级实质，才能排除这些措施在现象上的矛盾，抓住它在实质上的统一。这也是旧作所未能作到或未能完全作到的。

上述这些缺点和错误，用今天学术界的水平来衡量，都是属于常识性的，不是争论性的问题。既因为彻底修改，会打乱旧作的结构和体系；也因为这些缺点和错误，在今天的理论水平之下，不至于产生流毒；故基本未作修改，只在这里简单地加以批判。

* * *

最近以来，由于担任了少量的元史教学，使我有机会重温旧业，因而接触到某些有关元史的著述，也初步探索了某些教学必需涉及的问题，逐渐对某些有关元史的问题形成了一些粗浅的看法。其中一部分是当前学术界正在讨论当中的问题，一部分是目前还没有提到争鸣日程上来的问题；有些是旧作曾经表示过一定的看法，而今则看法有所改变的，有些是旧作未曾接触到，而今才初步提到自己的研究日程上来的。这都是些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很难一下得出肯定结论的问题。因此也利用这个机会，简单地提出自己对其中几个较大问题的初步看法和想法，以求正于学术界。

首先想谈一谈从蒙古诸部的统一到蒙古大帝国的形成这一历史事实究竟应当如何评价的问题。过去的学者对蒙古诸部的统一很少给予任何评价。对蒙古向西向南的扩张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争，则统称之为侵略，为野蛮屠杀，而一概加以否定，这自然是不恰当的。而今天有些同志，为了肯定成吉思汗，除指出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的进步作用外，同时对由成吉思汗开始或由他打下了基础的蒙古向外扩张，也一概加以肯定，这也很难使人信服。这个问题似应分为（一）蒙古高原诸部的统一，（二）蒙古的向西扩张和（三）蒙古的统一中国这样三个部分来加以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成吉思汗经过了一系列艰苦的斗争，统一了蒙古诸部，结束了长期以来蒙古高原“天下扰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的混乱局面，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为蒙古本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符合当时广大蒙古牧民的要求的，是对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是应当肯定的。多数同志都对这一点没有异议，这里就不多谈。

关于蒙古的向西扩张，特别是成吉思汗的西征，有些同志也认为它是正义的，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持这种论点的同志们的的主要论据是：（一）西征的动机是为了复仇和雪耻，因为花剌子模劫了蒙古的商队，又杀了蒙古的使臣，因此这一战争是正义的。（二）西征的结果，促进了东西民族的接触，扩大了商业交通和文化交流，因此它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我对这两点论据都有保留。首先，如果爆发战争的导火线——或者更具体地说，发动战争者的藉口，是可以用来判断战争性质的话，那么，路西坦里亚的被击沉和珍珠港的被轰炸，不都可以用来作为肯定美帝国主义插足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正义性的理由了吗？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曾指出过：“证明战争的真实阶级性质的，自然不是战争的外交史，而是对各交战国统治阶级的客观地位的分析”，^[1]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又指出：“历

[1] 《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2页。

史上常有人搜集了许多奇闻轶事当做大事件的小‘原因’，——而事实上这只是一种导因，只是一种外部刺激，‘事件的内在精神完全可以不需要它’。”^[1]以复仇雪耻作为理由来肯定成吉思汗西侵的同志们，不恰好是忽略了列宁的上述指示吗？其实成吉思汗的西征，以及继之而起的拔都和旭烈儿的西征，都是掠夺性的，是蒙古那颜阶级的阶级本质特别是在他们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时候所导向的必然结果。完全是侵略性的，是非正义的。至于扩大民族接触、商业交通和文化交流的进步作用，这只能说是侵略战争的副产物。事物总是有两面的，但其间应有主从，我们不能看不见为从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明确为主的一面。由西侵而产生的民族接触，商业交通和文化交流的光明面和由西侵而产生的民族仇恨、经济破坏和人民死亡的黑暗面，是无法比拟的。历史上任何一次侵略战争和对外扩张，都曾或多或少地推动过民族接触和文化交流，难道我们都应该只抽出这一点进步作用而一概加以肯定？有些同志又是抽象地肯定统一的进步意义，把统一是促进历史发展的而割据是阻碍历史发展的这一原则绝对化了。统一之所以是促进历史的发展的，是因为它创造了发展生产力的条件。因为在统一局面下，劳动人民可以安定地从事生产，可以在较大范围内推进物资和技术的交流。但这要放在具体情况下来考察，要看统一的时代和统一规模的大小是否和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相适应。不是在任何历史发展阶段和形成任何规模的统一局面都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当十三世纪的初期，蒙古高原、中国本部以及整个中亚和西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是否要求一个地跨欧亚两洲的军事封建统一大帝国来作为发展生产力的场地呢？显然是不需要的。蒙古大帝国很快地就四分五裂，正是由于这一广大领域内各地区相互间没有稳固的经济联系这一事实在政治上的反应。这一历史上空前的大帝国，不惟没有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恰恰相反，正因为创立这一大帝国所进行的大规模的远征和维持这一大帝国所进行的长

[1]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69页。

期的内战，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和生产事业的破坏，在实际上是破坏和阻碍这一广大地区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推动它的发展。这不是很清楚的吗？因此蒙古的西征，只能认为是侵略性的，是阻碍历史发展的，是非正义的，是不应该予以肯定的。

至于蒙古的统一中国，其性质又与蒙古高原的统一和蒙古的西征互有不同。既然蒙古族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统一中国之前就与中原各族有长期的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这就不能与一般的外族入侵混为一谈。在蒙古统一中国的前夕，整个中国呈现出四分五裂的局面：南宋和金中分南北，西夏和西辽割据在西北，吐番和大理分立在西南。其间彼此冲突几无宁岁。蒙古的南下，结束了这一个自五代以来三百多年的分裂和混乱局面，进一步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规模。这和秦的统一六国有若干类似之处，只是统一的规模更广、所包各地区间发展程度的差距更大而已，这是应当肯定的。决不能沿袭大汉族主义的观点，把它看成异族入侵而加以否定。但是这一统一国家的形成过程，却存在着极大的阴暗面。那就是蒙古统治集团在统一战争中所采取的屠杀、掠夺和民族压迫等落后手段，它给我国内地各民族带来了种种惨祸、灾难和痛苦，这种结果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看来是无法避免的。当时的客观条件是：在中国内地分立的几个国家，一般都是内部矛盾尖锐，统治集团腐朽，已面临崩溃的前夕。能代表广大人民的要求，实现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来完成统一全国的任务的，只能是这一个刚刚取得内部统一、生气勃勃的蒙古民族；而蒙古民族恰好是受了历史条件的限制，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水平都是比较落后的，战争中的劫掠、屠杀，还是他们历史发展在该时期所认可的合法手段。因此在蒙古民族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各种残酷暴行，是当日历史条件的必然结果。是在那种客观条件下，推动历史发展，完成统一任务，必须付出的高额代价。这种代价确实太高了，因此我们绝不能因为蒙古民族完成了中国的统一，而对蒙古统治集团所采用的残暴手段也加以原谅或肯定；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对当年坚决反抗蒙古征

服者的各族英雄，也始终加以赞扬和肯定。因为他们反抗蒙古统治集团所采取的掠夺和屠杀的暴行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是站在人类正义这一面的。这样把统一事业的进步意义和统一战争的残暴手段予以区别对待，既不受大汉族主义的流毒，把蒙古民族所完成的统一事业看成外族入侵而加以咒骂；也不因统一事业是有进步意义的，而对蒙古统治集团在统一战争中所采用的残暴手段也加以隐讳和开脱。这样评价，是不是更妥当一些呢！

既然蒙古的西侵是侵略性的，蒙古南下统一中国所采用的手段，又是十分残暴的，这种非正义的战争为什么能够所向克捷呢？过去认为这是由于蒙古的骑兵、弓箭和其他先进武器的优越。这种唯武器论的错误观点是无须驳斥的了。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首先在破除蒙古兵力所向克捷的历史迷信，然后分析蒙古终于胜利的原因。即以成吉思汗西征之役来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蒙古攻讹答剌外城为时五月，攻子城又相持一月；攻玉龙杰赤费时七月；攻讹思来忒忽堡也费时七月；1221年还被扎阑丁战败于巴鲁安。蒙古在中国本土的用兵，也是旷日持久的。与西夏的斗争相持二十二年（1205—1227）；与金的斗争相持了二十三年（1211—1234）；与南宋的斗争相持了四十二年（1234—1276）。在具体战役中，完颜陈和尚曾以四百骑败蒙古军八千人于大昌原；王坚死守合州，宪宗围攻七月不能下，终于在钓鱼山下负伤身死；蒙古军围攻襄樊两座孤城，在南宋小朝廷惧不敢发救兵的情况下，守军仍坚守了六年（1268—1273）。这些都是彰彰在人耳目的史实，蒙古军队何尝是无坚不摧、所向克捷的呢！然而蒙古军队在这些战斗中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原因又何在呢？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蒙古军队所遭遇的对手，都是些统治阶级昏庸腐朽、内部矛盾尖锐复杂的民族或国家。如西征的主要对象花剌子模，它在蒙古西征时，已经是在大力向外扩张之后到了盛极而衰的阶段。国内包含着各类矛盾：如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之间的矛盾，康里军人与一般平民之间的矛盾，不同宗教之间的矛盾，伊斯兰教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甚至算端与母族之间的矛

盾。又如中国北部的金国，在蒙古进攻之际，也是内部矛盾重重，到了总崩溃的前夕，如以杨安儿所领导的红袄军为代表的农民起义，遍地爆发，以耶律留哥为代表的契丹人的复国运动；以张柔、董俊、史秉直、石天应等为代表的汉人地主反金降蒙古的浪潮，更从内部拆散金的藩篱，加以胡沙虎、朮虎、高琪等女真统治集团内部的冲突，金的政权，更是摇摇欲坠，蒙古所遭遇的其他对手，也绝大部分是处在类似情况之下。因此蒙古在军事上的最后胜利，是不足为奇的。既不是由于武器的先进，也不是什么“天威”或“神助”，更谈不上是什么“以义反不义故战必胜”了。

其次想谈一谈在元代百年左右的统治期间中国在经济文化方面有无成就及应如何估价的问题。过去的传统看法，总认为蒙古民族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都是落后的，所以在蒙古贵族统治下的这一百年左右的历史，在经济文化方面都是毫无建树可言，而且甚至是倒退的。这是长期以来大汉族主义的偏见给我们遗留下来的错觉。只要对元代在经济生活和科学文化方面略一深入，就可以发现与过去错觉相反的一幅比较光明的画图。在人民经济生活和生产技术方面：如棉花种植的推广，和捍、弹、纺织技术的传播与提高，使当时的中央政府单从江南三省即可每年榨取木棉十万匹的税额。又如航海线路的改进，航标的设置，潮流、风向、气象规律的摸索与总结，使初期逾年始达的航程压缩到“不过旬日而已”。在科学文化方面：郭守敬的《授时历》，早于《格黎哥里历》三百零二年，而达到与后者基本一致的水平。朱思本的舆地图，丰富了地理知识的宝库，完备了计里画方的方法，李杲、朱震亨的医学，破除了《和剂局方》的束缚，创立了独立的家法。马端临的史学，重视了社会经济，否定了五行、灾祥，初步反映了历史发展的线索。以关汉卿为首的元代进步杂剧作家，以纯熟的技巧，无情地揭露统治阶级的黑暗，坚强地鼓舞人民的斗争意志，立场坚定，爱憎鲜明，构成了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光辉的一页，这在我国经济、文化史上都有划时代的贡献。当然这些成就，不能归功于元代统治阶级的某